

中国留学生政策讨论会

A PANEL DISCUSSION ON THE POLICY OF SENDING STUDENTS ABROAD

编者按：美国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于1988年5月15日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举办了中国留学生政策讨论会。

全美华人协会在美国各地有14个分会，会员多为科技、教育界人士。协会自成立起，为促进中美两国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交流，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以来，协会的许多成员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过组织、接受及培养留学生的工作。他们对近年来我国留学生和派遣留学生政策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很关心。在讨论会上许多人结合自己过去的经历和感受，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着重在留学生政策方面作了探讨。这次讨论会是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后召开的。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潘毓刚教授主持了讨论会。现将吴京生、蒲慕明、袁休、谢定裕、丁学良在讨论上的发言及部分自由讨论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发表，以飨读者。由于时间关系，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如有与发言人原意不符之处，本刊负责更正。

潘毓刚(全美华人协会主席)：留学生对中国近代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中国和日本几乎是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向西方学习的，但日本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而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其中原因虽然很多，但留学生政策的不同，可能是原因之一。怎样派留学生，派什么样的留学生，留学生回国后怎样发挥作用等，都会影响派遣留学生的效果。在中国向现代化进军的今天，我们来讨论留学生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留学生政策与今天许多在坐的朋友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希望大家能尽量客观、冷静地讨论这个问题，通过这次讨论探讨出一些比较合理可行的建议和措施，促使中国早日脱离贫穷落后，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今天的讨论会是由全美华人协会总会及哈佛大学中国同学联谊会联合主办的。先请特约的发言人发言，然后请听众发言或提问。

吴京生(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我们这些人当年都是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的，因此今天

谈这个问题能够比较客观，看得也比较清楚。留学生问题很多，我今天准备谈两点：1.当前处理留学生事务的方式和一些政策问题；2.留学生政策问题的长远考虑。我认为同国内谈留学生问题应有以下几点认识：首先要对留学生表示信任。对大多数留学生来说，并不想呆在国外不回去，况且美国政府也不会给所有申请人以资助和签证，国内对此担心过多也是没好处的；另一方面，国内目前正处在改革调整时期，国外的大批留学生回国，安排上可能会有一定困难；此外，更重要的是多一些留学生在海外作长期进修、学习，对国内不是没有好处的。因此我认为处理留学生问题应该是信任，而不是怀疑；是劝导，而不是强迫。国内有人担心人才外流，我认为如果政府与国外留学生的关系处理得好的话，这个问题是不必担心的，反之倒可能真会有人才外流。我感到国内对某些政策性问题的作法不太妥当，如政策不能完全公开等。记得1979年国内刚开始准备向外派留学生、访问学者的时候，国内领导人曾

希望我们这些海外华裔学者们多作些工作，希望美国同事和学校领导对中国派遣留学生工作给予协助。从那时起还不到10年，今天的情况又怎样呢？去年我邀请了一位国内的访问学者，国内开始时批准他一年，但当他到上海集训时又临时通知，凡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只能是半年。这给我的工作也带来一定困难。假如我当初就知道只能半年的话，肯定不会邀请他，半年时间来做合作研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国内说在留学生政策上、人数上和办法上都没有改变，我对此抱怀疑态度。实际上目前出国留学或进修所采用的GW-102表，就是一种控制。我认为不能采取这种办法来“卡”。

80年代初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时候，不存在这些人什么时候回国、回不回国的问題。我所知道的大多数人，到一定时间后都按计划回去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由于工作等其他原因推迟了回国日期。现在出现了许多问题，而且已成为很尖锐的问题，这当中有很多原因。国内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其中不少与留学生问题是有联系的，比如回国留学生有些不能妥善安排等。留学生问题本来很简单，现在的问题主要出在国内管得太多，像“自费公派”等政策引发出的一系列问题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国内是否可以借鉴一下50年代台湾派遣留学生的一些做法。除了管得太多外，对于留学生的管理办法也出现过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有损于政府的威信，忽紧忽松，忽左忽右，使大家失掉了信心。最近公布的国家教委关于留学生留学的细则，我看后觉得许多规定不切实际。比如，读学位的年限规定，没入学之前是根本无法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学位的。还有，取得博士学位后，申请做博士后要由国内单位批准，这在时间上和程序上都是不大可能的。诸如此类的规定，我认为都是管得太多，又不切合实际。解决留学生问题就是一句话：能不管的就少管或不管。

蒲慕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今天谈中国的留学生问题，我想先谈谈台湾的留学生情况，因为台湾派遣留学生的历史比较长，资料也比较多些。

大家知道，过去20年，台湾到美国来的许多留学生都没有回去，即所谓的“人才外流”。最近中国制订的一些办法、细则等，主要也是为防止“人才外流”。台湾的“人才外流”情况近年来有很大改观。根据一些统计数字，50年代至70年代初，留学后回台的人数，仅占整个留学生人数的1/10，大约为1万人左右。直到70年代中期，每年回去的大约在500人上下。1979年情况开始改

观，呈直线上升趋势，1987年回国人数有2000多，而同期每年出国的人数在5000~6000左右，回国人数的比例大约为40%。有趣的是，为什么会有回国人数逐年增多的情况？一般的解释是台湾经济发达了，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社会为各种人才提供创业的机会也多了。其实台湾的经济早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起飞了，只不过近几年发展更快些而已。我个人认为，台湾留学生“流回”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近几年，特别是1985~1987这三年，台湾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如旅游、观光的出入自由，取消各种“禁令”（党禁，报禁）等。我在加州大学的一个朋友对此就很有感触。5年前他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就想回台湾去工作，但一直拿不定主意，因为每次回台湾短期访问，都感到人的意志受到压抑，无法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回去不合适。两个月前他又回去了，这次的感觉很不一样，一年来情况有很大改观，知识分子讲话能起作用了。如“立法院”有很多人提到教、科、文经费预算不合“宪法”要求5%的规定，引起很大争吵。这种事过去政府是不管的，这次居然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改（其中还有些其他妥协）。所以，吵一吵，教、科、文的经费就上去了。还有前不久发生的台湾全体铁路司机“休假”一天事件，造成了全岛交通大混乱。过去可能就会镇压或辞退，这次不但没有任何暴力发生，“交通部”马上检讨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以便改进。通过这些事情，他最近下定决心回台湾去。所以，在国外的留学生看来，对知识分子意见的尊重，对民众呼声的接受，并不是政府丢面子的事，而是政治开放的一个象征，因此得到留学生们的认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出入自由，甚至有些取得在美居留权的人，认为在美的前途不如在台湾好，因此还是回到台湾去了。在台湾，他们每年都可以有机会出来参加学术会议，教育界还有个规定——每3年可以出国进修一次，这样也就没有必要一定住在国外。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在日本、西欧等国的留学生，回台的人数与出来的人数之比大约也为1/10，并不是因为美国比较容易留下才留下了更多人。

我非常同意吴教授讲的，国内对留学生管得太多、太死，而许多本应由教委或派出单位管的反而没管好，如公派留学生的专业分布、去何学校等都不大考虑，似乎除了分配名额外，其他一概不管。所以我发现有许多公派留学的名额分到了不对口的单位，如偏僻的院校分到名额后可能随便就指派什么人出去了，而农学院、林学院这些国内非常需要人才的单位，出来后又找不到个

适的进修单位。实际上主管留学生的部门应该有专人负责，帮助这些留学生找到合适的院校，使他们回国后学有所用。留学生的专业分布也不合理，如来美的留学生，学理工的很多，而学文、法、商等文科的很少。台湾经济发展中，留学生究竟起到多大作用，还没有很明确的结论。不过从历年回台留学生的专业分布统计数字看，商科学生人数最多，其次是社会科学。我认为工商、企业管理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但国内派出的人数实在太少，公派留学生中应增加这方面的名额，而理工方面较易得到国外学校的资助，公派名额应减少。关于留学生延期或不回国的问題，要当事人进行经济赔偿是应该的，前题是严格区分开公派和自费，而且必须公平实施，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能有特殊。

国内现在担心人才外流。国内的确有很多人才，但不能充分利用已有人才，也不能真正发挥回国留学生的作用。为能有更多的留学生学成后尽早报效祖国，必须从政策上改善国内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和待遇，虽然短时期内很难做到，但必须下这个决心。

袁休(美籍应用力学教授)：我工作的这个学校有很多中国留学生，而且物理系又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一个系。我曾经参与过留学生的录取工作，对此有些感性认识，但我并没有象其他几位发言人那样做过深入研究，因此今天只能谈些感想。

我个人认为，中国今天的留学生政策，毫无疑问是个紧缩政策。以我所在的物理系为例，今年的录取名额大概有一半准备给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因为他们申请的人多，且成绩相当好。但其中大部分人，有的我甚至与他们所在单位的外事部门谈过，仍始终未能最后肯定是否能被批准出来留学，因此我们的录取决定以及资助计划也始终不敢定下来，担心到时这些人一旦来不了，我们的年度计划就要打乱，给各方面带来不良影响。我说中国的留学政策是个紧缩政策，其实也不够全面。实际上对公派留学生有所紧缩，对自费留学生则仍和以前一样，完全没有政策规定。公派留学生包括国家公派与单位公派。国家公派受名额的严格控制，单位公派则灵活得多，而且人数远远大于国家公派，但需把名单报到教委批准。自费公派似乎没什么限制。另一方面，每个单位在审批留学生问题上权力都太大，不仅对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对自费公派也是如此。比方说教委规定毕业后需在单位服务一段时间，但没有规定具体多长时间，因此各个单位有各自不同的年限要求，这样他们就有绝对权力决定什么人有权

格出去留学。对于那些没希望得到国家及单位公派名额的人，许多人中途辍学，以免受服务若干年的限制。所以单位权力过大；带来的后遗症是相当大的。

我与国内出来的留学生讨论过，为什么国内突然实行紧缩政策。主要原因可能是防止人才外流；另外，即使都回去的话，带回去的“自由”思想太多也不好。紧缩政策是否就可以防止这样的效果？我的看法与吴教授相同，完全不可能。对于已经出来的人，这种政策肯定使他们想方设法不回去；将要出来的人，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出来，因此更不肯回去。更重要的是败坏了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过去，学生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申请奖学金，现在学习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大家都千方百计拉关系，走后门，甚至退职、退学，走自费出国的道路。这种影响恐怕与十年动乱把教育完全搞垮同样严重。

对国内的情况我想提几条建议：1. 应有个公平的留学政策。中国自清朝起就开始派遣留学生，但直到今天政策始终是反反复复。当然这些年来也取得不少共识：中国落后，所以应该派人出来学习；要选派最优秀的人出来学习；学成以后都应该回国，这是国内近来特别强调的。2. 自费留学也应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台湾对自费留学有留学考试，有些没有考取公派的优秀人才，也可以通过自费的渠道。同时国家也可根据需要，调整自费留学的专业结构。3. 改善回国人员的条件，这点非常重要。

谢定裕(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四年前，我曾就中国的留学政策作过相当详细的分析，并且预测到二三年后，就会面临大批年青的留美学生滞留不归的问题。现在看来，当时还言之过早，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现在，我四年前的预测大体已成为事实，而留学政策正成为最热门的论题。因此先回忆一下我四年前的旧话，不是毫无意义的。

正和成千上万台湾的学生滞留美国的理由一样，现在的留学生都以一种似乎合乎“情理”的私人选择方式为依据。经过四五年学习，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外行人看起来似乎是学成名立，说实话，在学问的道路上，这还只是个开头。有志向学要求更专更深的留学生，确实会觉得学识还不够充实，需要再有一二年时间进修（博士后研究生）或观摩（到工业界去实习）。这样六七年的美国生活，使他们的言行、习惯、思想等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美国化；甚而有的已在美国找到对象，结了婚，有了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子

成员也有权影响他们的行动。这些留学生的学留,因为都是以这种合乎“情理”的温和的私人方式出现,相信中国官方也不会用粗暴的方式来答复。另外在第一批留学生中,恐怕有不少是高干或中干子弟。他们的家长也会在国内运用各方面的影响力使其子女避免不愉快的干涉。

从另一角度看,这些留学生作出“暂时”不归的决定,内心也未必有什么歉疚。他们在美国求学期间,大多数人可说未费国家分文。那些曾受出国资助的留学生,也可能会表示愿意偿还国家的费用。他们还会说,他们如果回国去,国内尚无条件的让他们学得其用,发挥专长,也无机会可让他们去开创什么局面。与其埋没在与日常生活及官僚体制的奋斗中,不如“暂时”留在国外,以待他日学有所成,再以“外国专家”身份回国,还可以受到国家特别礼遇及政府领导人的接待。

中国当局如果认为派遣留学生来美国,到最高学府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有美国的奖学金负担学生的费用(私立大学费用每年已超过15000美元),学成之后就回国服务,这可能是一本万利的事,但这只是中国政府的想法。

如果这些留学生学成以后留在美国,美国就占了很大的便宜。这些国家把十多年辛勤栽培的优秀青年送到这里来,美国只需再培养四五年,就可以留为己用,岂不是极大的便宜。如果他们以后回到其本国去,他们就等于是美国的文化大使,会把美国的文化及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带到他们的国家去,影响他们的社会,使得他们的国家倾向美国。这是美国政府的想法。

任何对人民负责的政府,都会有一套不使自己国家吃亏的作法。如果中国的作法果真是一本万利,美国迟早就会限制中国留学生的到来,或者减少对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反之,如果美国的想法对了(这些年来,他们大体是没有算错),大批中国留学生被他们吸住不归了,负责任的中国政府也势必要检讨他们的留学政策。

留学生是否会回国,分析到最后,还是条件问题,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政治条件等等。抗战以前,中国到外国的留学生,差不多个个都回国去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国外没有什么好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因回国后的待遇十分优厚。

如何得体地鼓励留学生回国,是一十分复杂的难题。经验告诉我们,台湾多年来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台湾当局对待归国服务的留学生的原则是归国时间愈短愈受礼遇。他们的基本假设是,只有在美国混不下去的人才会回国。如果你是回去作短期(一二星期至一两个月)讲学,所受礼遇最高,住豪华的旅馆或招待所,领导人接见,

报章吹捧。如回去工作半年或一年,就住较差但仍还讲究的专为归国学人所建的宿舍。有人在一年以后说要永远留在台湾了,立刻就得搬出讲究的宿舍住到普通宿舍去。这是明显地告诉人们,如要回国服务,就得自认低人一等。这样自然不是鼓励留学生回国的做法。于是,有的留学生为了要回台湾,特地先取得美国国籍再回去。中国大陆是否会走上同样的途径,也很难说。

关于留学政策的目标,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应是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事物,是“取经”。如果现行的政策不能达到原想达到的目的,就必须加以检讨及修正。所以,就先进知识学术的引进而言,从国家的立场来说,将其重点放在派遣年青学生到美国来读学位,显然是很难达到目的的。现在将留学的方向加以调整,确有需要。

在目前中美之间生活水平差距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任何限制留美的企图,执行起来都是会有困难的。因此也有人说,与其徒劳无功,不如索性不加限制,听其自然。而且深一层也可问一下,是否真有限制的必要。

首先,我们要在此强调,留学人员的派遣,是学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不能堵塞。问题在如何使留学人员及时回国。否则就成为单向的流失,而不是双向的交流。

仔细分析一下过去美国对台湾留学生的吸收量,每年能吸收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应该只在3000人上下。中国方面门户开放得再大,美国方面也自然会把关守住。国内大学毕业生现在每年已有50~60万人。所以最多只有5%左右的大学毕业生会流失到美国。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还是会留在国内的。如果国家能珍惜重视这批人才,就让那5%人才流失,也没有什么要紧。

不幸的是,这5%的留学生却在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受到扭曲的影响。高等教育最崇高的目标,现在在学生心目中就是“留学美国”。重点的重点大学已有成为留美预备学校的趋势,研究院也只是留美的跳板,所以这5%学生的流失并不严重,可是对余下的其他学生的士气及学风的影响却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如何纠正这一不良影响,是目前中国教育当局所面临的最大考验。一个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国内极宝贵的最好的受教育和发展机会(包括与国外的交流),应该留给能长期在国内为中国服务的优秀青年。

既然国家派遣留学人员的主要目标是使派出去的留学人员从国外学到对中国有用的科学技术,带回国内发挥作用,两年前我曾提出下列建议:

1. 只派遣已有根基的学者或技术人员出国;

2. 学习的目标及内容十分明确;
3. 每次出国期限以不超过一年为原则, 但可根据需要多次出国;
4. 不读外国学位。

现在我仍坚持我的观点。

有人说, 人才的培养有如琢玉。礼记有言: “玉不琢, 不成器”。因此未琢之前, 并不是真正的人才。以此来比喻留学, 留学生在未出国以前还不是真正的人才, 在国外学了几年, 得了博士学位, 或再继续深造多年, 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因此留学生留学不返, 不能算是人才外流。但是人才的问题也有许多方面。大学毕业生毕竟已受过十六七年的教育, 在一般人民教育水平还很低的落后国家, 已是相当稀贵的人才。他们如果到外国去一去不回, 也还是一种人才的外流, 对国家也是一种损失。

有人说, 不应该持狭隘的国家观念。从世界的角度看, 与其让半琢的玉埋没在中国, 何如让琢成的玉器发大用于美国, 这样对人类的绝对贡献会更大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在发展中的国家所做的许多工作是一种创业性质的工作, 物质条件, 社会条件都要艰难得多。因此有一步两步的进展, 实在比在有现成完善设备的优越条件下的十步八步还要难能可贵。如果人类发展的目标是世界大同, 那么这些工作总要有有人去做, 迟早要有人付出这样的代价。钱学森如果不回中国, 他大概会写出更多的论文, 会得到几枚奖章, 美国的科学院会多一名院士, 但他回到落后的中国, 却带动了一大片科技领域。许多早年回国的留学生, 如留在国外, 他们个人也许会多一点学术成就, 但对美国却只是锦上添花; 而对中国, 即使是在弯曲的不顺利的道路上前进, 他们所开的路, 所起的激发作用, 不但重要; 而且没有他们有些领域很可能一直仍是一片空白。从整个人类立场来看, 他们回国所作的贡献比留在国外无疑是更大的。

分析到最后, 人才流动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经济的差距。高能物理学家或尚可振振有词地说, 只有在先进国家才有施展抱负的机会, 大批亚洲的医师也流入美国, 能有什么其他解释呢?

留学生是不是有在国外追求幸福的权利? 关于这一点, 相信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人都会承认肯定的。留学生为了争取这一权利, 写公开信, 向政府及社会申诉, 或者用其他方式来斗争, 也没有什么不对。任何个人为了他自己的幸福而争取权利, 是没有人可以反对的。但别人是否同情及支持, 却是另一问题。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

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 留学生的权利事实上只能算是一种“特权”。西方的“人权”强调个人权利的争取与维护, 不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根据中国的传统(尤其是知识分子), 一直强调匹夫对社会的责任。因此留学生要提出“个人权利”来作为滞留不归的理由, 恐怕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同情的。

留学生虽然是中国的一个“特权”阶层, 但这“特权”阶层中, 却还更有“特殊”份子, 那就是留学生中的干部子弟。留学政策之迟至今日才开始修正, 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因为涉及一些干部子弟的利益。许多留学生之敢于滞留不归, 也正因为有干部子弟带头为表率。现在留学的限制加多了, 他们是不是仍照样可从其他渠道到美国来呢? 他们是不是仍然可以毫无困难的得到护照的延期, 单位的批准呢? 他们是不是仍可从后门钻各种漏洞而不受国家法规的约束呢? 这一留学生阶层中的不公平问题, 倒是可以引起大多数人的同情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的反应。

如果因为留美学生的滞留不归, 中国果然持续减少留美学生的派遣, 而且相对增加对欧洲, 对日本, 甚至对东欧国家及苏联留学人员的派遣, 美国方面势必会采取一些对应措施。因为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 他们是不放弃留美学生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的。

我们不知道美国方面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假定其效果是使得有相当数量的留美学生会回到中国去, 使得“留学美国”多多少少真有一些双向交流的实质, 那么, 相信中国方面一定也会再重新调整留学政策, 使美国方向的门路开放得更宽松一些。所以, 中国对于留美所采取的限制措施, 也许正可促成比较更健康、更稳定的中美之间在留学方面的交流。

丁学良(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 任何一个政府的留学政策都不是个简单的留学问题, 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的许多基本价值观念, 如个人选择的权利, 如何看待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如何定义国家利益? 如何衡量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 民族利益与政府利益有何关系? 如何看待个人与社会、国家与政府、民族与人类的关系? 怎样衡量知识发展对社会进步的作用? 等等。因此, 可以从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出发, 对留学生政策进行各个角度的评价。

1.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给留学生政策提出的问题和启发。

自从有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人们相信, 要使一个庞大的、

复杂的、牵涉到亿万人的国民经济合理运转，必须经过中央计划。这个中央计划统观全局，富有远见地估计到未来若干年内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因此可以排除非计划经济带来的种种不合人意的波动、混乱、浪费和无效，使人类社会的财富达到最合理的使用。这种理想的计划模式在许多国家实行了几十年，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血的代价，于是出现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抛弃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向下放权，向市场调节过渡的时候，留学生政策却表现出僵滞的变化。以前个人和基层享有的一点留学方面的支配权，现在统统被卡死了。教委制订了许多硬性规定，如留学的年限及若干个“不准”等等，许多不切实际。我认为在这些规定背后起作用的，就是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我们不禁会想，如果这种计划经济连机器制造、粮食、猪肉、蔬菜的生产都管不好，难道可以管好人才的培养与发展？！靠对内、对外的开放搞活，大陆的经济才走出了改革以前的困境，难道人才培养却反倒要走封闭的道路？！通过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市场经济与集中计划经济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启发：高度的流动可能会有一些麻烦，但却可带来更多、更大的活力；集中控制似乎很合理，但实际生活中往往又带来缓、僵、卡。如果人才的高度流动必然会引起国家的衰退，那么今日的西方世界早就不复存在了。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实在太不发达，经不起人才流动。西方国家过去也是不发达的，是人员的交往和高度流动，推动、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相反，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几乎绝对没有人才外流，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没有带来中国的现代化。因此，留学政策应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吸取经验和启发，指令性的计划害大利小，计划只能是指导性的，必须有充分的灵活和变通。

2. 什么叫人才外流

我个人认为应定义为：很大数量的人才长期留在国外不回，且比较起来，这些人在国内时所做的贡献，明显大于他们在国外时对本国的直接贡献。这里特别强调贡献大小的比较，如果这些人出国前就已经做出很大贡献，学成回国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他们长期不回国才能算是人才外流，否则他们留在国外只能算是“费”才（浪费的人才）利用，因为人才价值的实现就是利用，否则就是“费”物。与其被白白地浪费掉，不如通过内导作用，自我实现。这句话或许可以代表中国许多知识份子的满腹心愿，如果没有亲身经受过大好年华被浪费，满腹才智被闲置的人，大概

很难体会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留学热，大概很小部分算是人才外流，大多数算是“费”才利用。

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最看重的莫过于专业上的成就；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他最看重的莫过于自己在专业上的发展能与祖国的发展结合起来，这才是他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才是他宁愿抛弃西方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而回国的真正动机。因为尽管祖国贫穷落后，如果周围的同胞，特别是有权力的同胞，能够真正珍惜你，尽量为你的研究创造条件，即使吃苦受累，却可以感受到温暖。假如你学到了一身的本领，抛弃掉西方的优越条件回到国内后，反而整天为油盐酱醋发愁，处处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那人们就不能不问：我回国的意义何在？难道把自己的才能浪费在自己的祖国，比贡献给人类更有价值？另外，要使爱国主义的召唤真正有力量，宣传爱国主义的人自己必须首先身体力行。

还有，人在外国是否就是人才外流？我认为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对社会的主要贡献，就是提供知识和信息。如果他们在国外的学习、工作和研究能成为向国内提供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来源，那么人在外国并不意味着人才外流。这几年，留学生在这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即便是那些已决定不回国的人，政府也应从长远观点着想，要看到是人才储备和联系桥梁的作用。我个人认为，要是中国大陆出来的留学生百分之百都不回去，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如果百分之百都回去，也不一定是件好事。比较理想的情况是20~30%留在国外，70~80%最终回来，否则就可能使两边的桥梁失去联络。如果不是过去几十年在国外有这么多人，1979年后中国也不可能一下子在国外找到这么多渠道。

最后我想提如下几点建议：

1. 中国在制定留学政策的时候，要破除过去的旧观念，广泛征求意见，并要能听进不同意见。

2. 派遣留学生，对派出国和接受国而言，应该是互利，而不是单行道。

3. 驻外使、领馆等机构要积极想些措施，充分调动和发挥留学生的潜力，把他们的知识、信息传回去，使国内外沟通起来。要把有能力留在美国，打进美国社会的人当作中国的长期储备。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一定要呼吁，即使开始作用不大或个人受到些损害也要呼吁下去。我们呐喊多了，以后的人再这样呐喊下去，效果可能就会大得多了。

自由发言

潘毓刚：刚才四位教授及一位国内留学生谈了对留学生政策的看法。下面是自由讨论，大家可以发表评论或提出问题。

听众：我对我所在的普林斯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调查。1979年来的第一批留学生共4人，全部留下来了；第二批有10人，9人留下来了；第三批至今还没有人回国。我去年回上海了解了一下：1979~1987年4月，上海公费派出的留学生（不包括访问学者）为3500人，回去的占15%；自费生出国的2900人，回去的不到10个。留学生不回去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 经济上差距几十倍；2. 政策方面的反复变化；3. 国内搞研究的条件不理想，这点是理工科学生最关心的问题；4. 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伤痕。我赞成刚才几位教授说的，出于对这个民族的爱心，我们学成后都应回去。但从现实情况看，我们这代人面临的形势，恐怕很难一下改变国内的局面，我认为从长远看，回去和留国外，何者对国家更有利恐怕还是个问号。20年前，台湾对留学生的态度同我们现在的作法相似，想限制留学生，结果不成功。20年后他们发现，从留学生中得到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好处。目前，一般来说，美国发明的东西，台湾最多半年就能生产。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留学生政策应放宽。中国人有民族性，有落叶归根的感情。他可以不可不认可你这个制度，也可能不喜欢这个党或那个党，但很少有出国的人不认中国的。中国古代楚国人才外流，楚王很着急，想采取禁止的办法。他身旁的大臣讲：失之于楚，得之于楚。这些出走的人是不会忘记楚国的。今天留学生的情况可谓：失之于中国，得之于中国。我们眼光要放远些，不能仅看回国的数量，要看有多少人成功地打入了美国社会。留学生留在美国，但他仍是中国人，仍会为中国着想并作事。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

听众：我想对留学生派遣进行简单的历史回顾。1872~1881年，清朝政府李鸿章往美国派了120个留学生，还有学监，后因有的留学生想同美国人结婚，中断了留学生的派遣，结果甲午海战，中国被日本打败，北洋海师全军覆灭。而日本留学生则从未中断过，且回去的人受到重用，依靠这些人，日本振兴发展了起来，后来又打败了俄国人。而中国甲午战争后一蹶不起，以至二次大战中被日本杀掉2000万人，至今元气还未恢复过来。因此可以说，派遣留学生是同民族存亡紧密相关的，限制只会把中国同世界各国距离拉大。国内

不应采取强制的作法，应尊重每个公民自己的选择，而国家利益正是无数人自我选择的总和。

听众：今年4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国家教委黄辛白的讲话，指出规定年限不是限制，而是对留学生的督促。我们可以理解国家及用人单位的心情。1986年11月报道留学生制度要进行改革，所有留学生要服从国家需要。我认为在国家人事制度还没有完全改变之前是必要的。另外，我们应对国外高等教育的学制、专业设置及学科优势等进行深入调查，编辑出版国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材料，以便留学生出国前对国外自己将学的专业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有所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

听众：谢定裕教授刚才讲要派有经验的人出国，且留学一般不超出一年。这里指的一年是如何考虑的？

谢定裕：我所指的一年是大致时间。50年代，日本派往美国的留学生通常是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就派什么样的人。派出的人有一定的经验，知道他将学什么，留学后再回到日本消化，如有需要，再出来。我希望留学生能不断地回国服务，又能继续出来学习。

听众：吴京生教授的观点似乎同其他教授的观点有所不同，请吴教授谈谈自己的看法。

吴京生：我想目前中国的情况与当年的日本有很大不同。改革正在进行中，过去遗留的问题相当多，而且又不断出现新的问题。过去我曾说过，假如我是国内研究单位的领导，我希望留学生在国外多呆一段时间，不要提早回去，因为他们回去后安排有一定困难。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的成就要充分肯定，并应给他们创造优良的工作条件。同时又要解决好目前40~50岁的中年业务骨干问题，这些业务骨干过去不是不要留学，而是当时的条件不允许他们留学。如果处理不好，这些人同回国留学生的关系会影响到整个科研单位的工作。留学生迟一些回国，届时安排起来比较容易。现在谈留学生回国，要看国内对科技人员的吸收能力。现在有许多问题还没解决，比如工资待遇，目前国内知识分子工资待遇还没有解决好，又回来一大批留学生，该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如用两套不同办法来对待这些人，后果是可以想象的。我确信，在我认识的从国内出来的人员中（包括反右运动中从香港等地出来的），尽管曾经受过很多苦难，几十年来他们对中国的感情仍没有变。因此，假如国家真正承认这些留学生是人才的话，

并能充分珍视他们对祖国的感情，经常同留学生保持联系，就不存在人才外流问题。

谢定裕：我赞成丁学良所说的最理想情况，即70~80%留学生回国，20~30%留下来。但目前的情况是95%的人留在美国。我想今天讨论留学政策问题应包括两方面：1. 将来的留学政策；2. 对目前正在外的留学生的政策。我同意吴京生教授讲的，从宏观上看，中国是人才外流，从微观上看，是人才过剩。因为任何大学或科研单位都让人回去，回去又无法安排，比如学高能物理的人，回去没有设备，也没有什么大用处。如果说过去的留学目标是“取经”的话，这是过去留学政策的失败。我同吴京生教授不同之处是：他认为留学生先留在国外，等等再说。我从统计数字上分析：等的时间越久，越不容易回去。

吴京生：这点我同谢定裕教授的想法是一致的。我当时一人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又从台湾到美国，在美国一呆就是30多年。但我仍能在许多方面为中国作事。这种贡献也许比我当初不离开大陆还要大。留学生学成回国后立即就能找到合适的单位并为国家作贡献是好事，也是有可能的。可是认为只有回国才能作贡献，留在国外就不能作贡献，就不爱国的想法也是不对的。

谢定裕：前几年我回国参观葛州坝，陪我参观的一名副总工程师，比我小一岁，是国内一所最好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他设计建造过不少水坝，我想他对中国的贡献要比我对中国的贡献大得多。

吴京生：中国从1949年到1980年，每年平均培养25万名科技人员。30年来，这个数目是相当大的。但能够真正发挥出才能的相当有限。人才浪费的现象很严重。我承认目前国内有许多年轻人担任重要职务，他们的贡献比我们要大得多，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机遇”太少了。当年我们，这些留在国外的留学生中，有一些人至今仍一事无成，可是基本上还能从事一定的专业，有一定的工作条件。相比之下，国内则差得很远。我认为有一些人才储备在国外，这对中国有一定的好处。

丁学良：我建议中国驻外使、领馆要组织留学生进行思想和学术交流，如对国家的经济改革、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的发展、科技发展等的讨论。现在虽有《神州学人》等刊物，但交流的机会还不够。通过交流，加强理解，加强责任义务感。日本在采取西方的先进经验方面要比中国彻底、迅速、广泛。他们从德国引进法律制度，从其他国家引进高等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工业制度。他们不仅引进别人的硬件，还引进软件。他们有共

事的基础，这种基础可以很快改变过去的作法。

而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软件方面就比较差。

听众：留学生的喜怒哀乐是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目前一些留学生在一段时间内不回去，国内要正视这批人；另一方面，国内要接纳这批人，不一定非等到这些人取得成就后才让他们发挥作用，要为这些人提供方便，使他们尽早发挥更大的作用。

听众：我想我们讨论任何政策，包括留学生政策，最终目的都应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国家要现实考虑一些问题。目前国内的博士生分配尚存在如何安排的问题，此外还有中年业务骨干安排问题。留学生政策是整个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方面，而目前国内的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不仅可以解决国内知识分子的问题，对留学生肯定也会有很大影响，就会有人愿意回去。因此，国家要继续提高整个知识分子的地位。

听众：光讲提高知识分子地位是不够的。留学生政策是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部分。请刚才几位教授谈谈当时如何决定留下来，现在又如何估价当时的作法的。

吴京生：我首先补充一点（这点与谢教授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免大家产生错觉，认为在美国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华。这是相对而言。对中国留学生来讲，在长期封闭、官僚主义的环境下出来后，到美国头几年你会感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自由发展。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年龄增长、职位的变化、责任的加重，就会发现在美国社会中生存也并不容易。就是和美国人做同样工作，你要比美国人花更大的气力。这里面有主、客观因素，如种族歧视、语言困难、东西方人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家庭教育不一样、价值观各异等等。另外，在这里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人，有时也会遇到麻烦。留学生留下来在工业企业工作的，许多方面会对你保密；在政府国防部门工作的，要受到种种限制，压力也很大。留学生患精神病的、自杀的，都说明了一定问题。

袁休：我们留在美国有多种因素。谢定裕教授认为多年没有回国，有种“内疚”(quilty)感，我也有同感。我在美国的贡献也仅限于学术界。如果当时回国或到台湾，贡献可能会大些。比如我的同窗好友回到台湾教书，就培养出蒲慕明这样的人。中国人在美国大部分只能在学术、技术上有所发展，因为美国人要用你。而要在政府任职或当大学校长，这种机会是很少的。

蒲慕明：我1974年毕业后曾申请去台湾清华大学工作，没有被录用，后决定留在美国。看一个人

的贡献要看所在的环境。国内属于创业环境，他们走的一步路可能要比在美国走十步路贡献更大。我在美国虽然写了许多论文，从绝对值来看我的贡献不少，从相对意义来看，国内人员比我贡献更大。个人在美国得到发展的可能性更大。台湾经济的发展，主要不是靠留学生，而是靠二流大学的毕业生，是他们把工商及经济搞起来了。这些人现在已是做百万、上千万元生意的经理。他们对台湾的贡献无法同我相比。这是不容易比较的问题。

谢定裕：我想对不想回国的留学生提一个建议：应该给自己划条线。如学成后只能找到洗碗之类的工作就应回去。我毕业后曾给自己划过线。我回国讲学时，宁波一个学生递条子问我：你为什么在美国不回来。我当时答复是：回不回国一要看国内能否给我提供工作；二是看工作有无意义；三要看自己是否能胜任。如果宁波大学让我当校长，我又认为有意义，可是我不能胜任，也不能当。

听众：中国的政策总的来说是外松内紧。对外来说是开放、改革，而对内卡得很紧。对留学生政策就是卡得紧的标志。管得太具体，教育没希望，广而言之，中国没希望。我们今天会议的声音是非常诚恳的，是从爱国主义角度出发，向中国政府敬献宝贵的意见，希望中国政府听取这些意见。首先要改掉那种莫名其妙、脱离实际、闭门造车的一些做法。看到目前美国的情况，我很乐观。以前，在学术讨论会上没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人，真是可怜。近几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因此，国内不必心急，不必担心，这些人留在美国，对中国不会有坏处，会有好处的，应从长计议。就拿杨振宁来说，他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也可为共产党服务。这就说明了，中国政府不要担心，只要国内争气，把国内的事办好，留学生自然会回来的。另外，不要怕留学生多了，会把自由主义带回来。

听众：刚才谢定裕提到派留学生以一年为宜，这可能不够合适。一是国内出国排队，不是完全按需派遣；二是语言不通，要么在国内长期培养，要么在国外有半年适应环境的时间。如果以一年为限，在中国基层单位会出现更为不妥的作法。

谢定裕：我讲的一年为限不是指大学刚毕业或读学位的，而是指有根底的、有工作经验的。读学位的从统计数字来看是不会回去的。

潘毓刚：谢定裕教授所讲的一年是有针对性的。留学生政策包括派什么人，是否读学位等问题。这次会议因准备匆忙，今天不能一下全面涉及到。我们曾议论到：发展中国家应针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多派不读学位，学了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留学生。这方面有日本、台湾的经验。台湾的发展中依靠的，连二流大学毕业生都不是，而是中专毕业生。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谢定裕讲的不是指念学位的人。

听众：很多中国留学生认为中国生活不好，自由程度不高，政治不够民主，他们想留在这里。有些留学生决心回去，把中国变好；有些人没有这样的决心，认为这样做牺牲太大。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这也是个人选择，应该尊重。就我本人来说，我也面临着选择。我不准备在美国再呆40年。我觉得40年后，我再和一些新留学生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就象中国1872年就开始派遣留学生，100年后还在这里谈留学政策问题一样。中国在100年前就找到德先生、赛先生了，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回中国。我并不想划一道线，线以上的就留，线以下的就不留，这是个人选择。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把中国的事办好。中国最基本的问题在于经济、政治环境。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大家无须乎在这里浪费更多的时间；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造成几百、几千人按价值规律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作出留与不留的决策。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人才确实很多。中国有一大批雄心勃勃，十分能干的人，在太狭窄的空间内争夺太稀少的机会。许多优秀人才只有一条跑道，在这条跑道上就会产生能人踩死能人、互相倾压、互相告发，许多非常恶劣的行为就会发生，所以我觉得，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也难，也不难，这就取决于大家努力的程度。

潘毓刚：今天的会议因时间关系就开到这。我们将在今年9、10月份召开有关中国高等教育的讨论会，欢迎大家届时参加。谢谢。